

宋人文集概述

王瑞明

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



宋人文集概述

王瑞明

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



宋人文集概述

王瑞明

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發行

(香港九龍官塘恒安街明輝大廈 2 樓後座 33 號)

網址: <http://www.hshkwh.com>

責任編輯: 陳家服

880×1230 毫米 印張: 25.25 字數: 628 千字

印數: 1-1000 冊

2009 年 5 月第一版 200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016670 號

ISBN978-962-870-276-3

ISBN962-870-276-9

定價: 港幣 80 元 人民幣 70 元



本書內容簡介

宋人文集之傳世者，約有 741 家。本書作者王瑞明教授從中選出 100 家 3593 卷，摘錄其重要史料，經過排比，分題組合，標點斷句，稍加詮釋，編出索引，在書中以黑底白字標明索引題目，以利查閱引用。所摘錄之史料，內容豐富，涉及宋代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教育、哲學、軍事、科學、技術諸方面，不少史料爲宋代基本史料書上所罕見，彌足珍貴。此書是作者讀書劄記之一，屬史料匯編性質，史料經過鑒定、選擇、提煉，刪節其繁蕪，存其精華，改異體、繁體字爲簡體字，爲讀者提供方便，更將同一問題的史料通過索引匯編在一起，指點史料綫索與研究途徑，成爲本書一大特色。本書編寫目的，在指出治史的重要方法在：勤讀書，苦練筆，多思考，重積累。史學研究，必須從搜集史料開始，任何見解學說，必須有史料根據，戒臆說，忌妄斷。

前言

王瑞明

宋人文集有多少部？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数字。根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所载别集 1824 种，除去宋以前的别集 800 余种，宋人文集约有一千余种，加上倪灿《宋史·艺文志补》宋人别集 250 家，则宋人文集至少有 1300 种左右。其中流失者不在少数，四川大学古籍所在编纂《全宋文》过程中，从各种渠道搜集宋人文集，收获颇丰，由沈志宏编出《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》，指出宋人文集之传世者当有 741 家。这些文集，一般人多难得一见，四川大学古籍所特编成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凡已收入《四部丛刊》及《北京图书馆所藏珍本丛刊》者不录，共收录 405 种，分为 108 册，由北京线装书局 2004 年出版，精装，初版虽仅印行 130 套，但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·别集》记载的宋人文集目录，在作者姓名、书名、卷数等方面，颇多讹误，给人们带来困惑。陈乐素先生长期对这些困惑进行考订，写成《宋史艺文志考证》一书，指出其谬误：关于姓名方面，徐寅误作徐演，吴沆误作吴沈，陈长翁误作陆长翁，王居正误作汪居正，张耒误作张来，王性之误作王惟之，方有开误作方有闻，鱼玄机误作鲁玄机。关于书名方面，宋绶《诂居集》误作《诂车集》，宋祁《西州猥藁》，“西州”误作“西川”，《黄幹文集》应为《黄榦文集》，《王庭云壑集》，“王庭”二字衍，此集作者为蔡桷。《郑脩集》，疑“脩”乃“條”；《刘攽集》之前有《刘纹集》，疑是《刘攽集》之误而重出；刘一止《苕溪集》之下别出《刘一止集》亦属一书重出。

关于卷数方面,《徐铉集》32卷,应为30卷;《李至集》30卷,《崇文书目》、《通志》均作40卷。关于版本方面,《欧阳修文集》分为“文集五十卷,《别集》二十卷,《六一集》七卷,《奏议》十八卷,《内外制集》十一卷,《从谏集》八卷。诸集之中,惟《居士集》为脩晚年所自编,其余皆出后人哀辑,各自流传。如衢州刻《奏议》,韶州刻《从谏集》,浙西刻《四六集》之类。又有庐陵本、京师旧本、绵州本、宣和吉本、苏州本、闽本诸名,分合不一。《书录解题》谓脩集遍行海内而无善本,盖以是也。”此文出自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集部·别集类六。陈乐素先生之所以引入《宋史艺文志考证》,在于说明其最初的版本情况,“遍行海内而无善本”。苏轼的文集则以苏州本为善本,“今考试集在宋世原非一本。邵博《闻见后录》称京师印本《东坡集》,轼自校。陈振孙所称有杭本、蜀本,又有轼曾孙峤所刊建安本,又有麻沙书坊大全集本,又有张某所刊吉州本。蜀本、建安本无《应诏集》,麻沙本、吉州本兼载《志林》、《杂说》之类,不加考订。而陈鹄《耆旧续闻》则称,姑胥居世英刊《东坡全集》殊有序,又少舛谬,极可赏。是当时以苏州本为最善。”此文出自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集部·别集类七,“以苏州本为最善”下,紧接着有“而今亦无存”。陈乐素先生反复引用《提要》,说明了其参考价值,不可忽视。

对于宋人文集的版本研究,有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。王重民先生历游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美国各大图书馆,他所见到的中国古代文献,或拍显微胶卷,或撰写提要。回国后,又经过多年研究,为宋人文集86家150种撰写提要,其中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者达53种之多。台湾《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增订二版所载宋人文集善本847种。中国大陆图书馆联合编制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其集部上册著录380家宋人文集善本2820种。这样,宋人文集的底细大致有了一个“底”。尤其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领导下,宋人文集点校本不断出版,这些点校本最可贵的是做出了校勘,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史料的准确。尚待点校的虽不在

少数,非不得已,不可靠四库全书的本子行事。因为清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在加强思想统治,推行文化专制,凡不利于其统治的言论、字句皆所不容。我在整理《李纲全集》时,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逐字逐句核对一遍,发现四库全书馆馆臣不择手段,大肆窜改,对书中的“夷狄”最为忌讳,改夷狄为强大,强邻、凭陵、异域、四裔、四方、边陲,寇攘、外患、外侮、金人、北人、戎马等,改“夷狄之虞”为“兴亡之虞”;“夷狄遁归”改为“昆夷息喙”;“夷狄猾夏”改为“猺狁内侵”;“中国夷狄”改为“南之与北”;“盗贼夷狄”改为“四方兵革”;“外攘夷狄”改为“外复境土”。这样窜改,皇帝也认为欠妥,四库全书馆所进《宗泽集》,内将“夷”改为“彝”,“狄”改为“敌”,乾隆皇帝说:“‘夷狄’二字,屡见于经书,若有心改避,转为非理,如《论语》‘夷狄之有君’;《孟子》‘东夷西夷’,又岂能改易?亦何必改易!”但皇帝的话也未被奉行,不仅照旧窜改,而且全文删削,《李纲全集》卷143《制虏论》,全文1800字,其文曰:“夷狄之为中国患也,惟北虏为最甚”云云,全文说明“征伐”非“全策”,全策是“谨守盟约”,语气温和,并未触犯满族贵族的尊严,但从目录到正文,竟一字不留,删削得不留一点痕迹。全文被删削的还有《李纲全集》卷150《论与夷狄同事》,“自古与夷狄同事,未有不为患者”云云,全文360字,也是一字不留。此篇与前一篇比较,火药味突出,其中心思想是“可以威服,难以恩结”,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,这样的文章之被删削是可理解的。虽然有的删削是可理解的,但其破坏原书内容,阉割历史,其罪恶不容抹煞、不可饶恕。我在整理《李纲全集》中,曾参考宋本(残)、傅增湘本、季锡畴本、光绪本、陈征芝本,各种版本皆有脱文,相形之下,四库全书本的脱文比较少,一般的讹误也比较少,因此可以说,四库全书本尚有参考价值。

宋人文集的史料极其丰富,宋代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思想、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皆有所论述。论述宋代政治的文章最多,这一方面说明宋人热爱祖国、关心政治、政治与每个人皆有血肉或利害

关系,不容你不关心。另一方面,宋统治者鼓励人民出谋划策,宋初四十年的励精图治,突出的一项措施就是大力保证言路畅通,赵匡胤为此刻有一誓碑: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,以此为家法,借言者之力以集思广益、折奸救弊。统治者既广开言路,而宋代社会矛盾复杂,问题较多,无论在朝在野,多乐于畅所欲言。

广开言路,这是政治上很重要的一项措施。毕仲游《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》:“仁宗皇帝所以四十二年天下安宁,大臣无甚纵恣,百官得行其志,不法之事,稀阔无闻者,以优礼大臣,而听用台官谏官之所致也。”其后,台官谏官逐渐不复知所以设台谏之本意,专为含糊苟且之政,出现“城门闭,言路开;城门开,言路闭。”形势紧急则求言,天下太平则拒谏。言路一经堵塞,下情不能上达,忠邪不分,是非易位,奸臣当道,国不成其为国。陈东以直谏死于前,马伸以正论殁于后。南宋时,都城之内,屡悬赏以拘捕“妄言之人”,台谏不尽其职守,不以社稷为念,不以生民为意,只知阿谀顺旨,“习闻顺旨之辞,罕陈兢业之戒。”^①纪纲废弛,廉耻汨表,习以为常。

宋代政治问题症结何在?宋人多以吏治为言。范仲淹言:“天下官吏,明贤者绝少,愚暗者至多,民讼不能辨,吏奸不能防,听断十事,差失者五六。转运使、提点刑狱,但采其虚声,岂能遍阅其实。故刑罚不中,日有枉滥,其奏按朝廷者,千百事中一二事耳。其奏到案牘下审刑大理寺,又只据案文,不察情实,惟务尽法,岂恤非辜;或无正条,则引谬例。一断之后,虽冤莫伸;或能理雪,百无一二。其间死生荣辱,伤人之情,实损和气者多矣。”^②由于天下官吏,明贤者绝少,愚暗者至多,“是使天下赋税不得均,狱讼不得平,水旱不得救,盗贼不得除。”^③李觏将宋代官吏分为四种,一刻薄,二柔邪,三诡激,四畏懦。这四种人一心只求自己的荣华富贵,不顾百姓的生死存亡。“故一邑之间,簿书不精,胥吏不畏,徭役不均,刑罚不中,民利不作,民害不除,鰥寡不恤,游堕不禁,播艺不增,孝悌不劝。”^④四

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。苏辙对宋代吏治腐败的程度进行了描述：毫厘之事，非赂不行，朝廷“于三司取天下所上帐籍视之，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发其封者，盖州郡所发文帐，随帐皆有贿赂，各有常数，已足者皆不发封；一有不足，即百端问难，要足而后已。”^⑤上下狼狈为奸，政治日趋腐朽。从而可知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的重要性。庆历新政失败，嗣后有熙宁新法，宋人文集中对新法充满叫骂之声，平心静气而论，新法是值得肯定的，在抑制豪强兼并势力方面成绩卓著，这是难能可贵的，因此而招致敌视。反对新法的苏辙，在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中，也不抹煞免役法之利。苏轼充分肯定免役法，“农民在官，贪吏狡胥，百端蚕食，比之雇人，苦乐十倍。”这是免役法优于差役法的一个方面。免役法使广大农民安心生产，不脱离生产，这是免役法优于差役法更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新法是成功的，基本上达到了“富国强兵”的目的。

宋人文集对宋代人民生活多有如实记录。王安石变法时，发生过饿死百万人的惨剧，其原因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，苏轼曾分析惨剧成因：“臣窃见近年诸路监司，每遇米贵，多是违条立赏闭粜，惊动人户，激成灾伤之势。熙宁中，张靓、沈起首行此事，致浙中饿死百余万人。”^⑥所谓“闭粜”，即严禁粮食买卖。粜，买进粮食；糴，卖出粮食。“闭粜”，即不以有济无、以富助贫，见死不救。宋代年年有成千上万的贫苦百姓死于灾荒，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：“三日天晴来报旱，一声雷发便撑船。”每年冬天，在风雪中冻饿而死者无数。宋代自然灾害之所以频繁，以及自然灾害之所以引起严重后果，是人事不修造成的，正如苏轼论灾荒时所说：“盖人事不修之积，非特天时之罪也。”王安石《上杜学士言开河书》指出“而旱辄连年，是皆人力不至，而非岁之咎也。”人为的灾害比自然灾害更凶猛，骇人听闻的饥荒是骇人听闻的剥削造成的，百姓被剥削得一无所有，偶遇灾荒，没有一点抗灾能力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在人为的灾害中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，王安石变法大力提倡造水利田，不惜破

坏生态平衡,使一些本来旱涝无忧的地区出现旱涝。灾荒之年,日子固然不好过,丰收之年,日子更难熬,丰岁谷贱,十不得四五之价;官府与地主借口“丰收”,逼租逼债,使不少人户家破人亡,因此宋代有“丰年不如凶年”之说。苏轼有一次深入农村,将所见所闻如实报告朝廷:“臣自颖移扬,舟过濠、寿、楚、泗等州,所至麻麦如云。臣每屏去吏卒,亲入村落,访问父老,皆有忧色,云:‘丰年不如凶年,天灾流行,民虽乏食,缩衣节口,犹可以生;若丰年,举催积欠,胥徒在门,枷棒在身,则人户求死不得。’言讫泪下,臣亦不觉流泪。又所至城邑,多有流民,官吏皆云:‘以夏麦既熟,举催积欠,故流民不敢归乡。’臣闻之孔子曰‘苛政猛于虎’,昔常不信其言,以今观之,殆有甚者。水旱杀人,百倍于虎。而人畏催欠,乃甚于水旱。臣窃度之,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,以天下言之,是常有二十餘万虎狼散在民间。百姓何由安生?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?”^⑦

宋代各族人民与天斗,与地斗,与人斗,在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交织发展的情况下,以极其艰难的步伐推动了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。宋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土地利用程度的提高,东南之郡,“山高者鲜不凿,土深者鲜不掘。”^⑧有诗曰:“种稻到山顶,栽松侵日边。”^⑨“百级山田带雨耕,驱牛扶耒半空行。”^⑩山区出现大量梯田,水乡泽国则出现大量湖田、圩田、围田、坝田,在华亭,“缘海筑堤百餘里,得美田万餘顷,岁出谷数十餘万斛。”^⑪适应土地利用程度的提高,水利事业有所前进、有所创新,如因地制宜,为引泉水灌田,而有木渠的设置,“木渠远自西山来,下溉万顷民间田。”“须知人力夺造化,膏雨不如山下泉。”^⑫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平衡,有的山区尚停留在刀耕火耨阶段,如陕西上雒郡南六百里,属邑有丰阻、上津,其民皆刀耕火种。四川与湖北的三峡地区也采用这种原始方法耕耘。宋代农业基本的生产单位为一家一户,农忙时节,全家出动,杨万里《插秧歌》:“田夫抛秧田妇接,小儿拔秧大儿插。”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。当时小农经济,面

临种种阻力,或来自官府,或来自大大小小的地主,或来自僧尼。宋代僧尼操纵的寺院经济恶性膨胀,南宋的陈淳,对寺院经济的实力作过定量分析:“举一州之产而七分之,民户居其一,而僧户居其六。”接着作了一番对比,民户“上等富户岁谷以千斛计者绝少,其次数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见,类皆三五十斛。”而僧户则较民户大为富有,“上寺岁入以数万斛,其次亦余万斛,或数千斛,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,虽穷村至小之院亦登百斛。”每个寺院的僧尼人数,“上寺不过百人,其次不及百人或数十人,其下仅五六人,或止孤僧而已。则岁费类皆不能十之一。”寺院所入十分之九皆浪费于无谓,“直不过为主僧花酒不肖之资。”^⑩宋代僧侣凭一纸度牒不交税,不服役,享有种种特权。享有特权的寺院增加很快,景德(1004—1007)中,有寺二万五千,嘉祐(1056—1063)间增至三万九千寺。不久,规模较大的寺院达四万一千二百馀,未统计到及不满三十间者不计。^⑪鄞县城内有寺二十六,城外有寺八十。泉州有“佛国”之称,其僧尼“未度者四千,已度者万数。”皇帝闻讯震惊。^⑫寺院经济对宋代经济所起的阻碍、破坏作用极大。但宋代经济的发展难以阻挠,在农业方面突出的是北方新开稻田,江南种植粟、麦、黍、豆,占城稻作为优良品种得到推广。更值得重视的棉纺织业的兴起,“嘉树种木绵,天何厚八闽。厥土不宜桑,蚕事殊艰辛。木绵收千株,八口不忧贫。江东得此种,亦可致富殷。”^⑬棉纺织业在南宋成为一项新兴手工业,以闽粤为中心,海南黎族妇女尤多织棉能手。宋代能工巧匠制造的精品有名茶龙凤小团,其品绝精,“凡二十饼重一斤,其价值金二两。”^⑭可与制茶业媲美的有造纸业,有纸帐、纸被、纸衣之作,陆游有“一条纸被平生足”之吟。此外如坊制的打破,交通频繁,造船业兴盛,海外贸易发达,南宋与五十多个国家通商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“重本抑末”传统政策一变而为“以农为本,渐重末业”。由“抑末”转变为“重末”,是宋代经济发展,科学技术进步促成的,也是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。梅尧臣认为“末

业”之兴是好事,他认为,“苟能使之发,亦莫取之穷。”如果只敛而不散,取之穷而不变,天下必然大乱。叶适主张“四民交致其用”,指出“抑末厚本”之非正论。出于叶适之门的陈耆卿,提出士、农、工、商皆本业,主张根除“本”与“末”的区分。

宋代重末思想的出现,可说与茶贩、盐贩不懈的武装斗争关系密切。茶盐贩之所以非常活跃,官府屡禁不止,因为有“十倍之利”可图,“务农而业技艺,所获无几,而其劳有不可偿者。”王质在江西见到“所资贩茶者,多辄千金,少亦百数,负者一夫,而卫者两夫,横刀揭斧,叫呼踊跃,以自震其威。”^⑧千百为群的茶贩,与农民起义军相呼应,屡与官军交火,官府调动诸路禁军、土军、百姓保甲,动以万计,皆莫可奈何。“茶寇”中声势较大的赖文政,淳熙二年(1175)在荆南起义,攻入湖南,转战江西、广东,连败官军,官军将领数十人战死,损失惨重。^⑨盐贩与茶贩一样,以武装护卫,“十百为群,被甲荷戈,名裹送者不下数十人。官司畏其生事,护送出境,得无侵扰已幸矣。”^⑩官司“护送出境”,显然是艰苦斗争的果实,充分显示“十百为群”的茶贩的凛凛雄风与势不可挡的威严。

宋代农民多灾多难,被逼上梁山的人很多,阶级斗争激烈。欧阳修写了很多札子报导王伦、张海、郭貌山起义的情况,各地起义军“建旗鸣鼓,白日入城,官吏逢迎,饮食宴乐。”地方官对农民起义军无比恭顺,因为“朝廷无赏罚,都不足畏;盗贼有生杀,时下须从。”顺阳县令李正己对入城的起义军,鼓乐迎送,还供应所需。《李纲全集》详细记载南宋荆湖间农民起义知姓氏者三十馀万,江西的农民起义军“蜂屯蚁聚,千百为群。”周十隆的名声最为显赫,是农民起义军一位重要首领。在文天祥的文集里论述了广西秦孟四起义,波及二十五郡。宋人文集里记录了宋代有很多“盗区”,即农民起义军长期统治的地区,分布于福建、江西、湖南,往往连亘二千里。

宋代科学技术,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。苏颂“水运仪象台”,

以水轮为原动力,配置类似钟表擒纵器的机械,使之自动运转,这就是“天文钟”,与指南针运用于航海,活字版印刷术、管形火器的出现,合称为四大发明。宋代在矿冶方面有突出成就,从苏轼的文集中,我们知道“北方多石炭”,以之冶铁制造兵器,“犀利胜常”。湖南少数民族能炼铁为“到钢”,以之为刀,锋利无比。从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卷75《洛阳牡丹记》,可知宋代接枝技术高超,“门园子”为牡丹接枝,每一接头,值钱五千,可买米三四石,这是当时的尖端技术。还有种花之法、浇花之法、养花之法、医花之法,园艺学很进步。宋代名医辈出,“如蕲春之庞、泗水之杨、孙晁、张锐诸公,未易悉数。”^①蕲春之庞,名时,字安常,其父是名医,在父亲指导下,饱读医书,融会贯通,得其精要,他的医术,有“聪明微妙”之誉。宋医分科很细,有妇幼科、牙科、眼科等。白内障手术在宋代已不为奇,苏轼《赠眼医王生彦若》:“琉璃贮沆瀣,轻脆不任触。而子于其间,来往施锋鏃。笑谈纷自若,观者颈为缩。运针如运斤,去翳如折屋。”这位眼医使用的手术刀“针头如麦芒”,医疗器械分外精巧。

宋史研究,不能离开宋人文集。我在宋史研究方面有所收获,主要是靠宋人文集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史料。宋代阶级矛盾的焦点是赋役问题,而不是土地问题,这是我阅读宋人文集的重大收获,为此我写了《两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》及《“等贵贱,均贫富”试释》。^②宋代“水利田”之非水利设施、朱熹天理论的历史意义,都是我从宋人文集中领悟到的。宋人文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,原因是多方面的:第一,宋代人写宋代事,而且多为其亲身经历之事,这就成为第一手史料了。宋代几部重要的基本史料书,无不大量引用宋人文集上的史料。第二、不少文集的作者是著名史学家,如司马光、欧阳修,深知秉笔直书的重要,为我们留下忠实纪录。司马光为了了解“衙前”之害,深入农村,访问父老,得悉农民“生具之微”的原因,就是怕充当衙前,“今欲多种一桑,多置一牛,蓄二年之粮,藏十匹之帛,邻里已目为富室;指挾以为衙前矣。况敢益田畴、葺庐舍乎?”^③

第三、宋人文集的作者多有丰富的阅历,《苏魏公文集》的作者苏颂,历事五朝,其文集所涉及的问题,多为其亲身经历之事。很多文集的作者由主簿、知县、通判而擢升为朝廷大臣,长期活动在政治舞台,如《郾溪集》的作者郑獬,就是由地方官升任知制诰、翰林学士。文集的作者不少人担任过两制的要职,为皇帝草拟诏旨,处理机要,洞悉机密。《苏子美集》的作者苏舜钦,当过主簿、知县、集贤校理。他的祖父苏易简,曾任参知政事。他的父亲苏耆,当过工部郎中。世代为官之家,见闻广博,对政治上的风云变化,比一般人了解得更多、更深、更细。苏舜钦对“州县之吏,多狡恶之人”的论述,指出其害“实政理之巨蠹,黎民之大害焉。”他更上疏,要求皇帝正心、择贤、纳谏,皆能抓住要害,论述精辟。还有兄弟同举进士,同任要职,同负盛名;如宋庠与宋祁,时以大宋、小宋称之,一官至宰相,一官至尚书。二人皆令其子不刊印文集,其后虽经合刊,不幸散佚。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宋庠《元宪集》36卷、宋祁《景文集》62卷,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宝贵史料,如“无马且不能为兵”之说,入木三分。第四、宋人文集的作者多是文学家,如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曾巩、陆游、善于观察、长于思考,文学技巧高超,描绘景物,记述人事,唯妙唯肖。四川眉山苏氏,以文学传家,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苏过祖孙三代皆有文集传世,苏洵的文笔“侈能尽之约,远能见之近,大能使之微,小能使之著,烦能不乱,肆能不流。”^②嘉祐(1056—1063)初,苏洵与其二子游开封,欧阳修见其文极为欣赏,不久又看到苏轼兄弟的文章,更是拍案叫绝。苏氏文集既是文学珍品,又是宝贵的史料书。第五、宋人文集,巨细无遗。土地问题是农民的根本问题,李觏《平土书》:“是故土地,本也。”又说:“法制不立,土田不均,富者日长,穷者日削,虽有耒耜,谷不可得而食也。”李觏还在《潜书》中说:“耕不免饥,土非其有也;蚕不得衣,口腹夺之也。”苏洵有专论田制之文,“田非耕者之所有,而有田者不耕也。”“而田之所入,已得其半,耕者得其半。有田者一人,而耕者十人,是以田主已累其半,以至于富强;耕者日

食其半，以至于穷饿而无告。”田制不立，土地不均，以及严重的赋役问题，在宋人文集中多有论述。许多细小问题，在宋人文集中亦不难找出详细记载，苏轼《秧马歌》并序，说明了秧马是用于扯秧而非用于插秧。

宋人文集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，但也存在不少问题。其一，支离破碎。各文集各有不同的版本，有的文集不是按时间顺序来编排，编辑方法不科学，很多奏疏、书信不注年月，有的文集残缺不全，编辑不完整，有张冠李戴的，或将别人的诗词误收入集中；有的是辑佚而成，有的原稿已不知去向。宋祁《景文集》原为二百卷或一百五十卷，还有说原为一百卷或七十八卷，现在所能见到的仅六十二卷（附拾遗二十二卷）。其二，空洞无物。文集中有的收有大量制诰，都是典型的官样文章，千篇一律，完全是搞文字游戏，为挽留一个官员，不厌其烦地再三再四讲空话。这类空话，对研究官僚主义、文牍主义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。文集中写风花雪月的诗赋不少，讲究一字之美，一韵之奇，对研究文学或探讨文学史虽不无意义，但对我们研究历史似很少帮助。有的诗集，脱离百姓，脱离生活，找不出一首具有生活气息或反映时代特色的诗词，如王沂孙《花外集》、周邦彦《片玉集》等。其三，有欠公正。文集中的铭志、章疏、书信中，由于时代阶级局限，不能实事求是，诬蔑农民起义为“盗贼”，辱骂王安石为“野狐”。南宋名臣张浚，力主抗金，负责指挥的几次战役皆失败，宋人文集中对他多所回护，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张栻，与朱熹齐名，同为道学大师。大家对大师的父亲，自然流露出几分敬意，有些话不能不有所保留。读文集时，对文集作者的政治面貌要有所了解，分清忠臣或奸臣。特别在权臣当权时期，忠良被排挤、遭陷害，冤狱相继出现，应注意明辨是非曲直。文集上的话，有的正确，有的似是而非，有的很明显是错误。一般而言，铭志多溢美，章疏多溢恶。这是我们运用宋人文集上的史料时特别应注意的。

《范文正公集》中的《岳阳楼记》，结构严谨，主题鲜明，词藻华丽，音韵铿锵，写景抒情，典型细致。文章把叙述、描绘、议论紧密结合，重点放在议论上面，抒发了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情怀，批判了封建士大夫浮沉宦海、追逐名利，患得患失腐朽的人生观。这是一篇散文名作。但其第一段提到“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”，与史实不符。范仲淹明知：“今四方多事，民日以困穷，将思为盗。复使不才之吏临之，赋役不均，刑罚不当，科率无度，疲乏不恤，上下相怨，乱所由生。若不急于求人，早革其弊，诚国家之深忧也。”^⑧庆历三年至七年间，正当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时候，湖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，范仲淹给王丝（敦素）写的墓表中说：“庆历中，湖南蛮人乱，攻劫郡县。言事者或请夷灭，或议招纳，岁时未决，生民甚苦之。朝廷选御史往究其事，以君为湖南安抚，至则察访利病；而前之主者，立重赏以诛蛮人，一级万钱，士卒贪之，往往害樵饷之人以为功。君下令曰：‘得贼之首者，必指其斗地以为质；其可擒者当生致之’。自是无枉戮者。”实际上，岳阳楼外远远近近被“枉戮”的无辜生灵不计其数。虎口余生者，生活悲惨，靠野菜苟延残喘。范仲淹接到报告：“往诸乡检旱，窃见贫民多食草子，名曰乌昧，并取蝗虫曝干，摘去翅足，和野菜合煮食，别无虚妄者。”^⑨这类严重的问题，皆非“虚妄”，都是范仲淹所深切了解的事实，“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”之说，从何谈起！

我们不能因为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里有歌功颂德、粉饰太平的不实之词而否认这篇名作的文学价值。《岳阳楼记》全文主旨所在的第五段，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；是进亦忧，退亦忧。”这些“忧”既反映了范仲淹的真实思想情感，更反映了产生其思想情感的时代背景。范仲淹忧国忧民，奋发有为，他在通、泰、海三州主持修筑长数百里的捍海塘；当西夏来犯，西北危急，延州诸寨失陷，他见危受命，为巩固边防贡献卓越；他主持庆历新政，主张改革吏治，名垂千古，功在千

秋。这些功劳不容否认或抹煞。

宋人文集史料价值很高,多为第一手史料,是宋代史料的宝库。但其实中有虚,真中有伪,我们应以审慎的态度,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,善于核实,善于抉择,善于引用。

- ① 楼钥《攻媿集》卷 26《论听纳》。
- ② 范仲淹《范文正公政府奏议》卷上《奏灾异后合行四事》。
- ③ 《范文正公集·补编》卷 1《论转运得人许自择知州》。
- ④ 《范文正公集》卷 8《上执政书》。
- ⑤ 苏辙《栾城集》卷 38《论户部乞收诸路帐状》。
- ⑥ 《东坡奏议集》卷 10《奏淮南闭籴状之二》。
- ⑦ 《东坡奏议集》卷 11《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》。
- ⑧ 李觏《盱江全集》卷 16《富国策第三》。
- ⑨ 王十朋《王忠文公集》卷 33《入长溪境》。
- ⑩ 楼钥《攻媿集》卷 7《冯公岭》。
- ⑪ 郑獬《郾溪集》卷 21《吴公墓志铭》。
- ⑫ 《郾溪集》卷 26《木渠》。
- ⑬ 陈淳《北溪全集》第四门卷 23《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》。
- ⑭ 苏颂《苏魏公文集》卷 17《奏乞今后不许特创寺院》。
- ⑮ 曾巩《元丰类稿》卷 49《佛教》。
- ⑯ 谢枋得《谢叠山先生文集》卷 1《谢刘纯父惠布》。
- ⑰ 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 2。
- ⑱ 王质《雪山集》卷 3《论镇盗疏》。
- ⑲ 朱熹《朱文公文集》卷 97《刘公行状》。
- ⑳ 杨时《杨龟山集》卷 1《上渊圣皇帝》。
- ㉑ 《攻媿集》卷 53《增释南阳活人书序》。
- ㉒ 王瑞明《中国古代史考论》,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7 年,页 185 及页 204。
- ㉓ 《司马温公文集》卷 25《论衙前札子》。
- ㉔ 曾巩《元丰类稿》卷 41《苏明允哀辞》。
- ㉕ 《范文正公政府奏议》卷上《奏乞择臣僚令举差知州通判》。
- ㉖ 《范文正公集·补编》卷 1《封建草子乞抑奢侈》。